

要建一座中国艺术资料库， 而不是自己的纪念碑

——莎拉·卡希尔谈父亲高居翰

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



2014年2月14日，中国艺术史研究者高居翰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家中与世长辞，享年87岁。

“令我害怕的不是死亡，让我害怕的是，我脑中还有这么多东西，我得趁还来得及，把它们提取出来。”晚年的他曾在博客中这样写道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周，虽然一直卧病在床，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的昏睡状态，需要长期服用吗啡来减轻病痛，但高居翰仍然在坚持制作关于中国绘画史的免费视频系列讲座。

据他的女儿、钢琴家莎拉(Sarah Cahill)回忆，就在他

去世的前两天，凌晨3点钟，他突然清醒过来，向家人索要了一支录音笔，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。他说自己做了很多梦，出现了很多幻觉，自己正在接近死亡。但他也意识到，自己的生命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，因为时间是由人们开始记录它而开始的，“艺术史学家一直试图记录艺术史，我也一直试图用照片和视频的方式记录宋代绘画的历史，这将是我的最终博客”。

这其实也是高居翰一直以来的心愿，将自己全部的学术资源分享出来，建立一座中国艺术资料库，供学者们研究使用。这座丰富的学术矿藏——“高居翰

数字图书馆”，如今坐落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，于2017年正式上线。高居翰曾经说，他不想这座图书馆变成自己的纪念碑，它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性的图书馆，对全世界中国艺术研究者有所裨益。

今年，在高居翰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，《文匯學人》采访了莎拉，请她从女儿的视角，回忆日常生活中关于她父亲的点点滴滴，包括对中国和中国艺术的热爱，以及他与学者之间的深厚情谊，以此纪念这位用毕生心血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美国学者。

(图为莎拉在中国美院，刘珊珊摄)

他想确证画中的世界是否真实，于是便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艺术

文汇报：在学界，高居翰先生被誉为“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”，站在女儿的角度，父亲在您印象中是个怎样的人？

莎拉：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强大的人。他有惊人的记忆力，他能记住自己高中时背诵的诗歌，能记住那些最晦涩的中国画家的名字，他们的出生日期和作品，但是，他却记不清楚我的生日。他是一个内心复杂的人，有时候看起来很孤僻，但总是慷慨和善良。在我和我哥哥尼克小的时候，他会经常制作各种玩具送给我们，比如精美的木偶剧院，为万圣节而准备的用纸制品、电线和其他家用物品做成的全尺寸骨架，用木屑制成的捕鲸船，以及用衣架制成的雕塑，等等。

文汇报：在您的印象中，他是如何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画产生浓厚兴趣的？

莎拉：在我看来，父亲是从零开始，直到现在成为一位出

名的人物。他并非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或是艺术世家，他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。我的爷爷是加州一个小镇上的游泳教练，当时他对我父亲是有点失望的，因为父亲没能如他所愿成为一名运动员，反而像个瘦弱的书生。后来，在美国大萧条时期，爷爷和奶奶离婚了，奶奶后来再婚。我父亲其实是由他们的朋友和家里的其他亲戚抚养长大的，他根本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家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一系列非常巧合的机遇让我的父亲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画。

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，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，最初他想成为一名作家。但过了不久，征兵开始了，我的父亲想要学日语，于是他就去参加了军队的日语学校。在亚洲的时候，他在韩国和日本的古董店里买了一些便宜的中国画。他对画中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想确证它们是否真实，于是便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艺术。从亚洲回到美国后，他参加了学校东方语言学习的项目，在那里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启示，那是父亲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。直到1973年他第一次去中国，他研究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资料，并开始大量撰写关于中国画的文章。

文汇报：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浓厚兴趣是如何体现的？他带您去看展览吗？会和您讨论中国绘画吗？很希望您分享一些细节。

莎拉：从最初的日子到2014年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，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影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存在。在我了解基督教之前，我就学习了佛教和道教。因为父亲，它们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我的家里挂着许多画，就在我每天练习的钢琴旁边。在我父亲生命的尽头，当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时，只有当他讨论中

国画时，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的兴奋和热情，仿佛回到了旧时的自己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每次出去旅行我们总会去看各地的中国画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亚洲。

我的父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在他的带领下去欣赏那些画作，会让我仿佛置身于画家笔下的那些景观之中。无论是在我们伯克利的家里，还是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(BAMPFA)，抑或是在我们的旅行中，每次欣赏中国画，他都会让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那些画作的细节，向

我展示为什么某些笔触是创新的或独特的，那些构图是如何在左和右之间找到平衡，以及画家们是如何把握构图的视角的。在他的讲解下，这些画作会变得截然不同。我相信，不光是我本人，还有许多人也接受过我父亲类似的引导。

所以我也逐渐意识到，他与这个领域的其他人进行辩论是多么重要，即他与中国艺术史学家们关于用“图像”(visual)还是“话语”(verbal)来研究画作的争论。他认为后者是“无艺术的艺术研究”(artless studies of art)，他认为一切都隐藏在画作本身，要从那里寻找。他很享受辩论的过程，也喜欢有一个持不同立场的“陪练”伙伴，这能让他更加严谨地论证自己的观点。此外，父亲也会将绘画和诗歌、音乐相比较，从格式还有手法的角度，这些都带给我很多启示。

文汇报：看来除了绘画以外，您的父亲也对诗歌和音乐情有独钟？

莎拉：是的，他喜欢古典乐。小时候，他会带着我欣赏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勃拉姆斯、马勒和斯特拉文斯基。在12岁那年，我弹了一首勃拉姆斯的“Intermezzo in A minor (Op.



“我的父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在他的带领下去欣赏那些画作，会让我仿佛置身于画家笔下的那些景观之中。”